

祖國強大與澳門回歸的歷史必然性

吳躍農*

1553 年歐洲航海大國的葡萄牙商人看重澳門的優越位置，以上岸晾曬貨物為藉口，賄賂時任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取得了在澳門沿海登陸的權利。葡人開始在此定居，每年向中國繳納白銀五百兩作為租金。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後，葡萄牙趁火打劫，武力佔領澳門半島附近的氹仔島和路環島，並拒絕向清政府繳納租金。1887 年 12 月 1 日，葡萄牙迫使清政府簽訂先後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定“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區治理它處無異”。澳門正式淪為了葡萄牙的殖民地，直到上世紀末。葡人在澳門生活及治理已近五百年，視澳門為其海外飛地，同出葡語文化一體。因此，他們打心底想牢牢管控澳門，不會有自動歸還中國的想法。

沒有中共領導人審時度勢把控大局，沒有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態勢，沒有愛國主義的堅定意志，就談不上去收回這塊土地，澳門就可能永遠離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 年不變。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脫離祖國母體 112 年的澳門回歸祖國。

與解決香港問題一樣，解決澳門問題是在鄧小平“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進行的，鄧小平傾注了大量心血，以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進行了高度原則性和充滿智慧的運作。這樣的原則和智慧來自於人民政權對祖國和人民利益的充分長遠考量。

一、新中國對澳門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研究建國後大政方針時確定：在原則上，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完全實現，東西南北少數民族地區必須實現民族大團結，決不允許脫離祖國，台灣、海南等離島必須解放，決不能讓反動派盤踞，西沙、南沙群島都必須在中國統一版圖之中，帝國主義在華、特別是沿海城市的所有特權必須取消，一律作廢。但在實施步驟上，要按問題性質和具體歷史情況分別處理，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緊密結合在一起，以對我有利為主，使我們能夠始終處於戰略主動地位。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政協會議圓滿舉行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舉行開國大典，他並沒有忘記少數民族地區，將應邀而來的新疆代表團賽福鼎團長拉在自己身邊，彰

*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院研究員、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理事

顯不可動搖的民族大團結立場。同時，對逃往海南、台灣的國民黨殘餘部隊的解決方案已經制定，林彪率領的四野已經揮師南下。更沒有忘記尚處在英國和葡萄牙政府控制治理下的香港和澳門。

林彪率領的四野，是一支精銳之師，從關外打到關內，無堅不克，為解放中國的大片河山立下卓著功勳，令蔣軍聞風喪膽。1949年10月17日，四野揮師廣東，勢如破竹，這時若趁勢收回香港和澳門，可以說只是打兔子摟草捎帶着就能辦了的事。但軍事畢竟是政治的手段，是時在政治層面並非收回港澳之佳時，所以，當解放軍進抵粵港邊界時，並沒有長驅直入這兩個西方所謂“飛地”，而是勒馬深圳河，深情佇望，揮鞭而去。這絕非外交上軟弱，而是中共中央審時度勢作出的明智抉擇。

毛澤東作出對港澳“不急於收回”的決策，暫時維持港澳現狀，固然讓前綫作戰部隊的將士不好理解，軍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沒有理解不理解的問題，但中共高層是領會毛澤東的先見之明的。毛澤東要採取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會主義陣營，學習蘇聯的行政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但偌大新中國，總要留有餘地與西方世界溝通和周旋，也要有通透之處，除了依靠散佈世界的海外華僑，港澳就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兩個有效渠道，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封鎖的鐵壁上有着天然口子，這是中國南方奇妙的血緣性的通向西方之路，用來服務於百廢待興的社會主義建設。

這一決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根據形勢作出的長久謀略。中共的愛國立場堅定：澳門是中國的領土，澳門問題屬於歷史遺留問題，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在未解決之前維持現狀。這樣做，十分巧妙地保持了港澳兩個能夠利用的中立港口，防止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全面經濟封鎖，同時避免選邊站後對蘇聯的過分依賴。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之後，充分證明中共這一決策的遠見性和正確性。所以，事過10年之後，在1959年，毛澤東指出：“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的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們還有用處。”

1960年，周恩來總結過去10年工作的經驗時，代表中央對香港、澳門工作正式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針，即暫時不考慮收復港澳，但應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外交戰略以及對台政策服務。鄧小平有一年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時說：“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

暫不收回，不是放棄，而是充分利用這樣的渠道擴大新中國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力，增強凝聚力，並在與港澳人士和英葡兩國的交往中積累善意與和諧，以利於問題最終和平解決。

二、中共始終堅持“和平的方法”解決澳門問題

毛澤東的高屋建瓴、高瞻遠矚，不需隱瞞，可以讓世人知曉。要讓澳門全體市民吃“定心丸”，這有利於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實施，有利於澳門渠道的暢通。

1955年10月8日，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客人談及澳門問題時，第一次公開表明中國政府對澳門問題原則立場，他嚴肅而鄭重指出：“葡萄牙政府準備慶祝澳門‘開埠’400週年紀念，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同時，他話鋒一轉，指出，“我們願意南方能夠安靜，而且既然我們主張和平共處，就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問題。我們迄今並沒有提出澳門問題，但是並不是說我們已經忘記這個問題”。60年代初周恩來代表中央提出“一綱四目”，這事實上已成為解決歷史遺留的台港澳問題的一項基本國策。

中國政府和平解決的決心是不容懷疑的，這也是治理一個大國的應有智慧和愛護澳門同胞的必然立場。60年代初，印度政府出兵，從葡萄牙手中奪回果阿。一些西方勢力不願意看到中國大陸與港澳的和平相處及渠道暢通，想合圍堵死中國的通路，惟恐天下不亂。借此挖苦嘲諷中國政府不如印度，是一個軟弱政府，不敢亮亮軍事肌肉武力收回澳門。既定方針不會動搖，但西方的惡語中傷和挑釁必須回擊。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嚴正聲明：香港、澳門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和平談判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這篇社論明確指出：“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

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的協議。中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發表前5天，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奉命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重申中國政府對解決香港、澳門的原則立場。信函指出：“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的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是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中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在未解決之前維持現狀。”同年11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以99票對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的壓倒多數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確認了中國對香港、澳門問題的主權立場與要求，從而排除了聯合國或其他國家干預這一問題的可能性。

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英國首相希思，在論及香港問題時，雙方都同意“香港在1997年應有一個平穩的交接。”81歲高齡的毛澤東，不無遺憾地對希思說：“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指着身旁復出的鄧小平，：“這是他們的事了。”這也是毛澤東對解決港澳問題的“政治交待”。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發生政變，薩拉查獨裁政權被推翻，葡萄牙新政權宣佈對外實行非殖民化政策，公開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1976年，葡萄牙新憲法規定：“澳門是在葡萄牙管轄下的特殊地區”。1979年2月，中葡正式建交。雙方就澳門問題達成諒解，雙方對澳門問題均有表述，中國的立場是：“澳門是中國領土，定將歸還中國。至於歸還的時間和細節，可在將來認為適當時候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葡萄牙表示：“葡萄牙政府原則同意中國政府的立場”。“葡萄牙憲法沒有把澳門併入葡萄牙的領土，憲法只把澳門看作是在葡萄牙管理之下。葡萄牙對於澳門地域管理的結束，將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之間進行談判。”中葡建交為兩國政府通過友好協商解決澳門問題奠定了基礎。

三、1984年鄧小平啟動和領導澳門問題的解決

中共着手和平解決澳門問題是在鄧小平親自領導下進行，他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鄧小平在構思祖國統一新方略時，是把台、港、澳回歸祖國問題作統籌通盤考慮的，將解決澳門問題置於解決台灣、香港問題，實現祖國統一大局中，在大政方針上，台灣、香港問題解決了，澳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鄧小平在領導推進香港過渡期事務的過程中，不忘澳門問題。在重要場合，總是將“一國兩制”政策和台灣、香港、澳門的問題解決放在一起來闡述。1987年4月16日，他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員時指出：“我們的‘一國兩制’能不能夠真正成功，要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裏面。這個基本法還要為澳門、台灣做出一個範例。所以，這個基本法很重要。”1990年9月15日，他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批評台灣有人想搞“一國兩府”，他說：“再也沒

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現在對台灣是個機會，對整個民族是個機會，需要大家努力，推動台灣走向統一。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大陸同胞，台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1984年是解決澳門問題的正式啟動之年。這年，中英兩國簽署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之後，鄧小平開始更多地關心和思考澳門問題的解決，並作了許多具體指導工作，從根本上保證了解決澳門問題這又一個祖國統一的重大歷史任務的順利完成。

1984年之前，他着重談的是解決台灣和香港問題，澳門問題是隱含其中的。1979年1月18日，他最先表明了“一國兩制”的政策胚胎內涵，在會見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特別任務小組議員團時說，“台灣回歸後，首先它的社會制度不變，它的生活方式不變”。他接着指出，“我們對待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政策也是如此”。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重要講話，闡明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建議。1982年1月，鄧小平在接見來訪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指出，葉劍英提出的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一國兩制”概念的第一次明確提出。

1984年10月3日，也就是中英草簽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的第7天，中顧委主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港澳同胞國慶35週年觀禮團全體成員，鄧小平更具體地說到台灣回歸和收回香港的基本政策，顯示出中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制度自信：“大陸十億人口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允許部分地區實行特殊政策，繼續搞資本主義。這個政策不會變。”

赫赫有名的澳門賭王何鴻燊是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成員。何鴻燊是1941年揣着港幣10元到澳門奮鬥成為“世界賭王”的。獨持澳門賭牌數十年的他，看到鄧小平，就說：“鄧大人好”。鄧小平笑笑，回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恭喜發財”。這句話讓澳門賭王吃了“定心丸”，他相信，看來在澳門進行賭業，還是可以繼續發大財。

在會見接近尾聲的時候，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出口商會會長吳榮恪舉手要求發言，他說：“我是澳門人，想請教鄧主任有關澳門問題”，這一問相當突然，鄧小平沉吟幾秒鐘，朗聲回答說：“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同一個時期，同一種方式解決。至於解決澳門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其他，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有利，我還在考慮。”停了一下，又重複說：“澳門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解決的時間比香港早好還是同時，這個問題正在考慮，想聽聽大家的意見。”這是鄧小平對解決澳門問題原則和方法作首次公開表態，也是中共領導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出要與香港一樣，用“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

由於之前中共領導人對澳門談得較少，鄧小平的這番“直截了當”的講話引起澳門社會的巨大反響。有正面的，也有不解和擔憂。應該看到，絕大多數澳門人對以“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解決澳門問題是接受的，澳門是中國固有領土，理應在條件成熟時回歸祖國。但畢竟是長久生活在葡萄牙的文化影響之下，許多澳門人對回歸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尚無充分思想和心理準備，鄧小平的講話因此顯得很突然，大家特別對澳門本土人士治澳是否能勝任表現出一定憂慮和不安，社會上一時議論頓起，各種紛擾夾雜而來。

澳門的工商界人士，捨不得離開澳門這個中西合璧，經濟開始起飛、較易賺錢的風水寶地，“東方蒙地卡羅”的賭城地位有着較長的產業鏈和文化底蘊，讓他們有業可創，有錢可賺，他們擔心回歸後政策有變，會失去大把賺錢的機會。對澳門社會的這些擔憂，中共迅速作出回應。三天之後，即

1984年10月6日上午，鄧小平特意接見澳門知名企業家、全國人大常委馬萬祺及夫人，第二次公開講澳門問題，談話以安撫澳門各界為主軸，他說：“澳門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內不談，甚至可以更長些時間不提不談，請大家放心，繼續工作。”鄧小平特別指出，“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澳門的情形，是如何保持安定繁榮……澳門的賭業可以繼續辦下去。”鄧小平的第二次“澳門談話”，起到了安定人心、穩定澳門社會情緒的有效作用。馬照跑、舞照跳、彩照博，這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形象說法。

鄧小平這兩次有關澳門問題的談話，既重申了中國政府澳門問題的一貫立場，也對解決澳門問題的時間、方式和方法作了原則性闡述。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問題塵埃落定，鄧小平對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共官員交代了一句話“香港問題解決了，就該到澳門了。”正是他的這句話，揭開中葡關於澳門回歸談判的序幕。

四、加強與澳門人士和葡萄牙交往，友好協商解決澳門問題

1985年2月22日晚上，鄧小平在廣州珠島賓館會見馬萬祺等澳門知名人士，黃鎮、余秋里參加會見。鄧小平向馬萬祺詳細詢問了澳門的經濟和社會情況。馬萬祺說，澳門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有較大的發展，1984年出口總值增長幅度較大。鄧小平微笑着連聲讚好。並鼓勵澳門同胞特別是工商界人士多做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工作。農曆春節除夕，鄧小平與廣東省黨政軍領導在廣州白天鵝賓館舉行新年聯歡會，專門邀請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出席。

1984年11月中旬，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葡萄牙，引起澳門社會巨大反響。李先念的隨行人員有主管港澳事務的外交部長，又有參加過中英會談工作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負責人，不能不使人聯想中共領導人此次葡萄牙之行，會談及澳門問題。

在公開場合，中國領導人總是主動談及澳門問題，而葡萄牙方面總是千方百計躲避這個問題。因為葡萄牙領導人中對澳門問題存在尖銳分歧：以總理蘇亞雷斯為首的“強硬派”，聲稱“澳門是葡萄牙主權之下的領土”，還說澳門沒有類似香港的“九七”問題，而以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平托為首的明智派，主張澳門是中國領土，應該交還中國。

有分歧，不焦急，車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可以慢慢來推進。中共領導人此行起到了吹吹風、通通氣的作用。中國外交部長在臨離開葡萄牙回答記者提問時，把問題挑明，他說：“李主席這次訪問期間，兩國沒有簽訂任何協議，因為協議在1979年兩國建交時，早已簽過了，現在是進一步會談。中方不久將派團赴葡萄牙進一步會談，屆時再做進一步聯繫。”

1985年5月21日至26日，葡萄牙總統馬里奧·恩尼斯應李先念邀請回訪中國，他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葡萄牙國家元首。恩尼斯是葡萄牙著名政治家，對鄧小平滿懷崇敬之情。5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他時“就像穩操勝券的統帥那樣，氣定神閒地吐着煙圈”，鄧小平親切地問道：“你喜歡訪華嗎？”恩尼斯笑着回答說：“我很高興與趙紫陽總理舉行了內容廣泛的會談，並且也會見了李先念主席。”

鄧小平風趣地問：“你們之間沒有吵架吧？”恩尼斯輕鬆地答道：“我們之間有一些問題，不過

並沒有吵架。”鄧小平表示：“我們之間不會吵架，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原則上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只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恩尼斯亦認為，“我們葡萄牙人願意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我們在這次訪華中看到中國也願意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雙方目標一致，就是保持澳門地區的穩定繁榮，維護中國、葡萄牙和澳門人民的利益。”鄧小平點點頭：“可以按照趙紫陽總理說的辦，雙方友好商量，這個問題不難解決。”

會見結束後，鄧小平打破慣例，一直將葡萄牙總統恩尼斯送出人民大會堂福建廳 30 多米，邊走邊跟恩尼斯輕鬆交談。以往鄧小平送客的慣例是只送到會見廳門口。這樣的外交禮遇，反映解決澳門問題在鄧小平心目中的重要位置，鄧小平對通過談判解決澳門問題已是成竹在胸。恩尼斯連聲對鄧小平說：“我有幸能見到鄧主任，感到十分高興，我回去以後定會努力地理解您剛才所說的話。”

恩尼斯到訪之前，中葡雙方已經舉行了外交部長級會談，並且已經就澳門問題的解決達成協議。1985年5月23日，中葡雙方發表了《聯合公報》，內容如下：葡萄牙共和國總統恩尼斯訪華期間，中葡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進行了討論。雙方滿意地回顧了1979年2月中葡兩國建交時達成的諒解和在此基礎上兩國政府在處理澳門事務中的良好合作。雙方同意於近期通過外交途徑就解決澳門問題舉行談判。

五、1986-1987 年間的中葡四輪外交談判

1986年3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共和國在同一時間內，公佈了雙方政府談判代表團名單。1986年5月20日，中葡兩國政府發佈了就澳門問題進行會談的“新聞公報”：經過友好磋商之後，決定在本年6月最後一個星期於北京開始談判，解決澳門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天有不測風雲。就在1986年6月30日中葡第一輪會談前，葡萄牙政局突變，對澳問題“強硬派”總理蘇亞雷斯競選獲勝出任總統，《葡萄牙憲法》規定，澳門問題由總統領導，然而《中葡聯合聲明》規定由葡萄牙政府負責，葡萄牙政界的權力之爭與澳門談判問題纏繞在了一起；其次，在6月10日的澳門“葡僑日”慶祝會上，葡萄牙國會事務助理部長魯奇勳聲稱，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人都不能奢望葡萄牙在澳門問題上作出讓步；葡萄牙外交部長也頻頻放出試探性“氣球”，暗示葡萄牙不會將澳門拱手送還中國，將竭力討價還價，使澳門永遠成為葡萄牙文化高高聳立在東方的一個橋頭堡。

儘管有這些嚷嚷聲，但中葡兩國政府已經簽約，談判和平解決澳門問題，已經不可阻擋。從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前前後後舉行了4輪談判。雙方保持了總體上的良好合作。

第一輪會談於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北京時間舉行，第一輪談判總體氣氛融洽友好，第一輪會談開始時，中國代表已建議會談的總議程：(1)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的有關問題；(2)中國對澳門行使主權後的安排；(3)過渡時期的安排。葡萄牙代表同意中國代表提出的總議程並按之討論。

首輪會談，中國代表提交了《中葡聯合聲明》草案的中、葡、英文版本，並對此作出簡要的說明解釋。中國方面對談判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採取寬容包容態度。

第二輪會談於1986年9月9-10日於北京舉行。第二輪會談時，中國代表提交《中葡聯合聲明》的附件，並作出相關說明。葡萄牙代表團表示需要對全部文件進行深入研究後，才能作出全面的評論，故提議在第三輪會談上才作出全面評論。

第三輪會談於 1986 年 10 月 21-22 日，葡萄牙代表作出意見反饋，對前兩輪談判中國代表團提交的文件，分為三類：“同意、接受的”、“需要作出適當修改和補充的”和“需要進一步弄清一些概念的確切內容和含義後才能做出評論的”。

第三輪談判遭遇澳門回歸時間等實質性問題，澳門回歸時間成為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雙方有爭執。收回澳門的時間，中方雖曾有過早於香港、與香港同時、晚於香港三種考慮，但前提是在本世紀之內，也就是說，最晚也不會遲於 1999 年。葡方出於自身利益和顏面，希望拖得越晚越好，理由是為澳門的繁榮穩定着想，要給澳門一個較長的過渡期。因此，葡方在談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把交還澳門的時間推遲到下個世紀再解決。葡方稱，香港 1997 年交接是因為租借“新界”的條約屆時到期，澳門不存在這個問題，如果能安排在 2003 年葡萄牙登陸澳門 450 週年歸還，更有“紀念意義”。葡萄牙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發言人公開表示，中國在 2000 年以前收回澳門治權的主張難以接受，最適當的時間是 2017 年，甚至有葡萄牙人主張“越遲移交越好”，企圖把澳門治權拖延到 21 世紀後期再移交中國。是時，一直關注和掌握談判進程的鄧小平向中方代表團發出重要指示。2000 年，新舊世紀之交，這是澳門回歸的一條清晰的時間界綫。必須在新世紀到來之前收回澳門，這是中國十億人民強烈的民族願望。

第三輪談判後的 1986 年 11 月 17 日，葡萄牙政府約請中方代表團團長及成訪問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單獨和中方團長會談。在澳門問題上他被“架空”了，心中有氣，發洩地說：“本世紀內交還澳門不合適，應考慮在 21 世紀的適當時間，來解決澳門問題。”中方團長當即反駁：“貴國的談判代表、特命全權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紀內交還澳門，怎麼你們又提出異議？”蘇亞雷斯有點蠻橫地說：“如果我們的團長同意了，那他說的話不代表政府。”中方團長當即把他的話硬頂回去：“如果照閣下的說法，今後我應該跟誰去談判呢？”蘇亞雷斯答不出來。這次正式談判議程外的會談沒有能夠談下去，僵住了，中方團長以“疲倦”為由取消了原定的在葡萄牙的參訪活動，匆匆回國。在離開里斯本機場時，中方團長向記者堅定地表示：“在本世紀末以前完成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大業，是億萬中國人民的意願，也是中國政府的決心。”

中方團長回來之後，李先念接見他，並說：“你做得對，就應該當場把他頂回去。”1986 年 12 月的最後一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鄭重指出：“在 2000 年前收回澳門，是中國政府和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十億中國人民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和強烈願望，任何超越 2000 年後交還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這是中方向葡方亮出了中共澳門政策的底綫——“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紀。”

1987 年 1 月 2 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在澳門發表談話，他說：“2000 年是個大關，中國人民不希望到 21 世紀，仍然有土地在別人手上。”

中國政府堅定地堵死了葡方企圖延期交還澳門管治權的一切藉口。一波才平，一波又起，是時，發生了“秘密協議失蹤事件”：澳門記者報道，對中國方面所說的中葡雙方 1979 年 2 月達成的建交秘密協議，葡萄牙總理席爾瓦等人都說找不到了，澳門總督馬俊賢應聲稱他也從沒看到過，要求葡萄牙政府給他一份文件副本，但是領導當時中葡談判的葡萄牙總統堅持說有這份文件。經過一陣折騰，秘密文件終於找到。與此同時，葡萄牙政府從原有立場退讓。

1987 年 1 月 6 日，葡萄牙召開所有領導人出席的國務會議，經 4 個多小時激烈辯論，最終原則上同意在 1999 年將澳門的主權和治權交還中國。

葡萄牙派外交國務合作秘書阿·蘇亞雷斯趕往北京向中國方面通報，阿·蘇亞雷斯抵達後，對中方談判團團長說：“我們經過最高國務會議的研究，同意貴國政府的意見，就是本世紀內解決，就在1999年的最後一天即12月31日交還澳門。”中方團長一聽，就說：“澳門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12月25日是要過聖誕節的，接着就新年放長假了。在放長假期間搞回歸慶典，合適嗎？是不是稍微提前一點？使澳門同胞過一個安安穩穩的聖誕和新年假期，政權交接還是與聖誕節和新年的假期錯開來為好。”阿·蘇亞雷斯說：“我做不了主，得報告政府。”過了二三天，他答覆說：“我們同意讓一讓，讓到12月20日。”

經過這樣的磋商協商，雙方在一些實際問題上取得廣泛一致，會談決定在雙方政府代表團下成立一個工作小組，中葡協議踏入草簽階段。

第四輪談判於1987年3月18日上午9時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正式舉行。至3月23日談判結束，這輪談判共密集舉行6次正式會議和5次私下接觸。新中國自成立之時始，就不承認雙重國籍，葡萄牙則允許雙重國籍。雙方發生爭論，葡萄牙強調雙重國籍是為了保護葡萄牙護照持有者的利益，維護葡萄牙國護照的“尊嚴”。國籍問題成為這輪會談的焦點之一。中方從澳門回歸大局出發，作了合情合理讓步，經友好協商，中方容許澳門葡裔澳門人士自行選擇國籍(即中國籍或維持葡萄牙國籍)。至此，歷時9個月的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會談，宣告圓滿結束。中葡雙方聯合發表新聞公報，宣佈兩國已就澳門問題達成協議。

1987年3月26日，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草簽儀式在北京舉行。中葡雙方談判團負責人分別在聲明上簽字。鄧小平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身份與國家主席李先念等出席了簽字儀式，對聯合聲明的各項表示肯定。同年4月13日，鄧小平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葡萄牙政府總理席瓦爾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簽訂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葡聯合聲明》及兩個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和《關於過渡時期的安排》。《中葡聯合聲明》載明，澳門地區(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和路環)是中國的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簽字儀式前，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會見葡萄牙政府總理席爾瓦，他說：“在不長的時間內，中葡解決了澳門問題，這為國際上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我們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從解決台灣問題着手，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受台灣問題的啟發，我們考慮用同樣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看來，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這類問題是成功的，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熱點問題提供了經驗。”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深入闡述了中國政府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立足點，他說：“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立足點是，解決香港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而解決台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台灣的利益。”

六、“一國兩制”和《澳門基本法》是澳門回歸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法律基石

1987年6月23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批准了《中葡聯合聲明》，宣佈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中國政府根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

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

中葡兩國政府在 1988 年 1 月 15 日互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同年 9 月，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負責起草澳門基本法。10 月，鄧小平會見了出席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委員，就如何起草一部高質量的澳門“小憲法”提出原則性意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起草《澳門基本法(草案)》時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細，宜簡不宜繁”、“參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都體現了鄧小平的思想。

1992 年春天，紅棉花開遍南國，88 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他不但在深圳眺望香港，還來到與澳門僅一箭之遙的珠海拱北口岸，在粵海酒店的旋轉餐廳深情凝望對面的澳門。這位“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總設計師，關注並推動着澳門回歸的進程。

南巡期間，鄧小平多次圍繞有利於實現澳門回歸的話題，暢談確保改革開放政策穩定性的戰略意義。鄧小平堅定地提出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推進對外開放與實行“一國兩制”構想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他在闡述“五十年不變”的思想時說，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的政策 50 年不變，基本法至少要管 50 年。50 年不變，50 年後更不變，他說，“我要補充說，50 年後更沒有變的必要。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50 年也不變。”

1993 年 3 月 31 日，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通過《澳門基本法》(共九章 145 條，以及三附件)。
《澳門基本法》從結構、體例到內容，都參考和借鑒了《香港基本法》的精華。此次全國人大會議還通過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辦法的決定》。

對此，葡萄牙總統桑帕約稱讚鄧小平“這位中國元老的構想將伴隨澳門 1999 年回歸中國後保持其特性”。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滿懷深情地談到，鄧小平提出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實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對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澳門的社會各界將對澳門用“一國兩制”回歸祖國表示極大的鼓舞。

1998 年 5 月在北京成立了由錢其琛為主任，由 100 名委員(澳門地區 60 人，內地 40 人)組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經過 4 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推選委員會具體產生辦法》等重要文件，並根據這一辦法，產生了全部由澳門永久性居民組成的、200 人的推選委員會。最後經過推委會對 5 名符合參選資格的候選人的兩輪選舉，選出了何厚鏵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

七、中共第三代領導親臨回歸大典

1993 年 11 月 28 日，江澤民訪問美國、古巴和巴西之後抵達里斯本，原計劃只經停加油，經協商變成了 24 小時訪問。江澤民與葡萄牙領導人就澳門問題和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會談，在涉及澳門平穩過渡的有關問題上取得共識。

1994 年 4 月，葡萄牙總理席爾瓦訪華。江澤民、李鵬在會見他時真誠地指出，澳門的後過渡期只剩下 5 年多時間，擺在中葡雙方面前的工作很繁重，需要加快解決許多問題的進程。

1997年2月，應江澤民之邀，葡萄牙總統桑帕約率團訪華，鄧小平不幸逝世。歡迎宴會被迫取消，桑帕約抵離北京時的國賓車隊也不得不適當調整行駛路線。江澤民在會見葡萄牙總統時表示，在澳門問題上，中葡雙方領導人應站在戰略高度上，分析形勢，站得高才能看得遠。

1998年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7位常委一起出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委會第一次大會的全體委員。江澤民與委員們一一握手，並指出：“澳門回歸祖國將為‘一國兩制’再次創造一個光輝的範例，還將有力地推進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1999年3月4日，江澤民看望出席“兩會”的港澳政協委員時說：“澳門我一定會去。香港回歸我去過，澳門從海上遠遠地望過，那時珠海還是個小漁村，這麼多年了，澳門、珠海都在不斷興旺發展。”3天后，江澤民在與廣東省人大代表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保持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堅持依法治澳。維護澳門基本法的權威，就是維護國家法律的權威。5月20日，朱鎔基簽署國務院第264號令，任命由澳門人選出的何厚鏞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之後，江澤民、朱鎔基等會見了來京接受任命的何厚鏞。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每任期為5年，最多可連任一次。10月下旬，江澤民以國家元首身份，對葡萄牙進行了被外電稱為“為十二月澳門回歸鋪平道路”的正式訪問，這是他出訪歐、亞、非六國之行的重要一站。他與葡萄牙的國家領導人廣泛接觸，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對澳門問題的立場，一度僵持不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的細節問題也取得突破性進展，葡方同意解放軍駐澳部隊先遣人員提前進入澳門。

1999年12月19日夜江澤民、朱鎔基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澳門新口岸交接儀式會場，零時，由中、葡兩國元首見證，中葡兩國進行了澳門政權的交接儀式。在交接儀式上發生了小插曲，儀式原定23時40分開始，但因葡方4位成員未能及時上台，再加上葡萄牙總統桑帕約感冒(後來證實患上肺炎)而講話超時30秒，整個儀式延遲了兩分鐘。為確保在12月20日零時準時奏中國國歌、升國旗，中方司儀加快語速，國旗護旗手亦在尚未完成掛旗動作時，讓特別行政區護旗手提前入場，順利搶回延誤時間。在2,500位中外來賓見證下，葡萄牙國旗及澳門市政廳旗(當時對外代表澳門的旗幟)緩緩降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凌晨零時零分零秒徐徐上升，政權移交順利完成。與此同時，澳門群眾夾道歡迎駐澳門解放軍進入澳門。

江澤民、朱鎔基出席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暨宣誓就職儀式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澳門的新歷史從此開始了。